

---

# 新文化运动在徽州的接受

## ——以胡适与胡晋接等来往书信为中心的考察

吴浩<sup>\*1</sup>

**【摘要】**: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一直与徽州学人有着密切往来。在新文化运动前后,他与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胡晋接、教师黄宗培等有数份书信往来,共同探讨文学改良、白话文等问题。胡晋接、黄宗培坚定地支持新文化运动的宏旨,但由于在办学上秉持新旧平衡的理念,以及教育不问政治的态度和严格训练的办学方针,他们对“新文化”的一些观念并不认同,在新文化运动愈加激进后,他们在微观操作层面持折中、节制的态度。安徽省立二师是其时徽州的最高学府,新文化运动在徽州的接受从中可见一斑。

**【关键词】**:胡适;胡晋接;新文化运动;徽州;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

**【中图分类号】**:K29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7)05-0021-08

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与徽州知识界多有交流,徽州学人对他的“文学改良”等思想或赞同或批评,文字往还间可以见出徽州知识界对“新文化”的态度。据余英时考察,“从社会史的观点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础无疑是城市中的新兴知识分子和工商业阶层”<sup>[1]</sup>。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简称“二师”)是徽州最高学府,因办学成绩卓著在皖南乃至安徽都有着极高的声誉。二师集聚了当时徽州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群体,新文化运动在二师的接受与否和接受程度,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在徽州的缩影。本文以胡适与安徽省立二师校长胡晋接、教员黄宗培的文字交往为中心,考察徽州知识界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

### 一

1918年8月8日,《时事新报》“学灯”副刊刊登“绩溪黄觉僧”的《折衷的文学革新论》一文。“黄觉僧”是黄宗培的笔名<sup>[2]</sup>,他于1916年暑假后受聘为省立二师国文教员,并兼任绩溪县教育会会长<sup>[3]</sup>。黄宗培在文中总体赞成胡适文学革新的主张,并力陈旧文学的弊端,但同时又认为“胡先生等所倡之说,亦不无偏激之处,足贻反对者以口实,愚今请以折衷之说进”:  
“(一)文以通俗为主,不避俗字俗语,但不主张纯用白话。……(二)符号之取用不可盲从西洋而当取其适用者。……(三)不用典故不讲对偶之说,愚亦赞成。但旧文体之著作不在此限。”

胡适和黄宗培是旧相识<sup>[4]</sup>,他从友人处得知这篇“赞成《新青年》所讲文学革新的文章”,极为重视,找来阅读后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就撰写专文回应,刊发于《新青年》杂志五卷三号“通信”栏。针对黄觉僧“不主张纯用白话”的观点,胡适表明主张用白话文的理由:“我们主张用白话最重要的理由,只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大字。足下若细读此篇,便知我们的目的不仅是‘在能通俗,使妇女儿童都能了解’。”对于黄觉僧用“方言不同”反对白话文,胡适反驳道:“因为方言不同,所以更不能不提倡一种最通行的国语,以为将来‘沟通民间彼此之情意’(用足下语)的预备”,“方言未尝不可入文”<sup>[5]</sup>。在同期《新青年》“通信”栏,胡适还发表《论句读符号》一文,针对黄觉僧与慕楼关于句读符号使用的观点进行辩驳,认为句读

---

<sup>1</sup>作者简介:吴浩,北京外国语大学教育基金会副秘书长,法学博士(北京100089)。

符号的作用在于“帮助文字达意”，“意越达得出越好”，“文字越明白越好”，“符号越完备越好”<sup>[6]</sup>。

1919年4月12日，黄宗培致信胡适，谈到这场笔墨官司：“去岁弟在上海《时事新报》登载一文，题曰《折衷的文学革新论》，寥寥数百字，意思多所未尽，乃蒙赐以指教，甚幸甚幸。敝处无《新青年》杂志，尊书乃友人为弟言之，语焉不详，以故未能作答。”黄宗培在信中重申其“折衷的文学革新论”：“先生等所倡新说，如文学革命、平民政治、社会主义、男女平等诸问题，宗旨弟均赞成，惟方法上间有异议。废汉文一说，弟绝对反对。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亦弟心中所期期以为不可者。至于贞操问题，弟意与其纯从消极方面破坏女子贞操，不如从积极方面提倡男子贞操之为有利而易行。”黄氏还表达了对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战斗角色的坚决支持：“愿先生鼓励勇气与群魔战，以期打破此黑暗地狱，取中国各种现状而新之，此百世之功也。即或不幸而至于以此身殉真理，亦足为世人尊敬。弟虽不学，愿联合同志为先生后盾，先生等其放胆为文。”同时，黄氏对《新青年》以及《新青年》诸先生作了尖锐的批评：“但若不从事理上研究，而徒肆口谩骂，如刘半农之言论，则弟实不敢领教也”；“弟非谓新党无可反对也，实以言论自由天经地义，旧党不循正当轨辙辩论真理，乃欲以黑暗手段取言论自由之原则而残之，此实世界之公敌，有血气者安可与之同日月耶。虽然，《新青年》诸先生亦有过焉，言论自由自言论自由，何苦以不相干之话予人以难堪，此亦不可以不反省者也。”<sup>[7]</sup>

胡适对黄宗培的批评颇为不快，复信表达了对安徽省立二师先生们的不满：“总而言之，如果先生们认《新青年》为‘洪水猛兽’，也该实地研究一番，看看究竟《新青年》何以是‘洪水猛兽’。如果不看《新青年》，又不准学生看《新青年》<sup>[8]</sup>，一意把‘洪水猛兽’四个字抹煞我们一片至诚救世的苦心，那就是‘取言论自由之原则而残之’的‘黑暗手段’了。”在信末，他还请黄氏“把这信请子承先生一看”<sup>[9]</sup>。

胡适提到的“子承先生”，就是二师的校长胡晋接。胡晋接在青年时期即立下“教育报国”的理想：“欲改造中国而非改造中国思想界不可。然欲改造中国之思想界，又非改造中国教育制度不可，盖教育乃一切思想之源泉，而小学又为教育之基础也。”<sup>[10]</sup>1903年，在江苏通州经商的绩溪县仁里村程序东兄弟四人，出资在家乡创办思诚两等小学堂，聘请胡晋接担任堂长主持教务。胡晋接因办学成绩卓著，后被任命为安徽省立第五师范学校（1914年2月更名为“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安徽省立二师从开办到结束的十五年间，始终由胡晋接担任校长，二师也因此打上了鲜明的胡晋接烙印。胡适早年的好友许怡荪、程乐丰等皆为胡晋接思诚小学堂的得意门生。因此之故，胡适与胡晋接有了书信交往<sup>[11]</sup>。

1920年，胡晋接致函胡适，说：“曩岁得你所著的《哲学史大纲》，于吾国学术思想进化的途径均有确实的证明，认为吾国第一部哲学史。此时吾国适当五千年思想革新时代，异说争鸣非得一先觉之指导，或至与真理相背驰亦所不免。近见《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尔所著的《新思潮的意义》，说‘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即‘评判的态度’，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句话我很信为吾国社会之对症良药。……篇中所提纲要‘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足为青年修养的指针。我对于此时训育学生的方法颇思准酌国情、判别个性为新思潮的指导，使一般青年有真正的觉悟、向上的精神。”<sup>[12]</sup>从信中可知，胡晋接不但读过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也读《新青年》杂志。

同年，胡适致信胡晋接，请他帮忙搜寻“绩溪汉学家的遗著”。信中说绩溪学者胡匡衷、胡秉虔、胡培塿“都是先生同族，不知先生能替我访求他们的著作否。……又这几位先生的事迹，贵族谱上定有私传，不知先生能为我钞一份吗？……如有未刊的著作，如信稿、日记之类，若能雇人钞一份，更是我极盼望的事。钞费邮费，当由我这里汇寄。”<sup>[13]</sup>胡晋接收到信件后钞了一些材料寄给胡适，胡适于8月2日回信表示感谢，并希望胡晋接“在乡党间”随时搜集绩溪学者“已刻未刻”的著作。胡适还赞扬胡晋接为地方教育做出了贡献：“乡间人来，皆说吾绩学务大有起色，此皆先生提倡之力，深所钦佩。”<sup>[14]</sup>

1922年，胡晋接致胡适函说：“顷由章大木弟以《努力》报数张见示，得知公等现方注意于制宪问题，并陈述所主张之数事，所言多切中时弊，且以制宪解决时局尤为救时之第一要义。……民国成立，垂十一年，而宪法迄未制定，诚为憾事。倘因此迟误，屡经研究，或竟制成环球最良之宪法，则又不幸中之幸也。……吾国古籍如《尚书》，如《周礼》，如历代之典章制度，先民遗产实有无穷之宝藏饷遗后人，俾供搜采者，今乃悉取而弃之，而惟西方已敝之法是循，诚未见其可也。”<sup>[15]</sup>胡晋接

赞同胡适的制宪主张，又略陈己见，“聊备贤者采择”。彼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战争对文明的巨大摧残使得中国知识分子重新思考西方思想文化和制度。和写作《欧游心影录》的梁启超一样，胡晋接也主张从中国传统中寻求思想资源。

胡晋接与胡适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书信往来是二人谈学论道的具体呈现，胡晋接对胡适“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等思想高度赞赏。胡适当时在致黄宗培、胡近仁诸人书信中，表达对胡晋接在二师禁止学生看《新青年》的不满，甚至称之为“取言论自由之原则而残之”的“黑暗手段”，但此种情绪在他与胡晋接的通信中丝毫未曾流露，还在给胡近仁的信中叮嘱关于二师“替陈独秀造了无数党员”的消息“千万不可让胡子承先生知道”<sup>[16]</sup>，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胡适对这位乡邦宿儒的尊重。

新文化运动期间，胡晋接与陈独秀亦有书信往来，从中可管窥胡氏对新文化运动的体认。

陈独秀早在清季即与绩溪汪孟邹之兄汪希颜交好，后鼓励支持汪孟邹创办上海亚东图书馆，并在亚东出版多部作品。胡晋接是汪孟邹的业师，曾出资让汪氏到芜湖开办科学图书社，因汪孟邹的缘故而与陈独秀结识。民初鼎革，陈独秀担任安徽都督柏文蔚的秘书长，曾与教育司长江彤侯论及“要办徽州的教育非请胡晋接来主持不可”。1917年胡晋接致陈独秀信中，对陈独秀引领新文化运动风气之先深表赞赏：“今先生所主张之救国主义，独从改革青年思想入手，此诚教育之真精神所寄。……以先生之大雄无畏，推翻数千年来盘踞人人脑筋中之旧思想，而独辟畦畦，以再造新中国，仆深信大志《新青年》出版之日，乃真正新中国之新纪元也。”陈独秀的复函也表达了对胡晋接的惺惺相惜：“先生讲学万山中，不识世俗荣利为何物，所遇门下诸贤，大都洁行而朴学，知先生之德教感人也深矣，溥矣。以硕德名宿如先生者，道破旧式思想之污浊，提倡教育精神之革新，新教育真教育之得见于神州大陆也，当为日不远矣。”<sup>[17]</sup>

## 二

民国初年兴办师范教育的进程中，形成了以师范校长、师范教师和师范生“三位一体”的“师范教育群体”。从前述黄宗培《折衷的文学革新论》、胡晋接致陈独秀与胡适书信可以看出，以胡晋接、黄宗培为代表的安徽省立二师教师，对新文化运动的宏旨是高唱赞歌、大力支持的。

胡晋接是一个思想开明的人，晚清时就“非常赞成康(有为)梁(启超)的新思想”，常常叫学生“要多读历史、地理以及新书、新报”<sup>[18]</sup>。他盛赞陈独秀和《新青年》的革新主张，对胡适《新思潮的意义》也推崇备至，足以说明他是新文化运动坚定的支持者。黄宗培总体上对胡适和《新青年》诸先生“共张文学革命之帜，推倒众说，另辟新基”持高度肯定的态度，并称赞胡适“见识之卓，魄力之宏，殊足令人钦佩”。黄氏编辑之师范学校国文读本，“虽所选材料，与胡先生等所主张者容有出入，而其根本主义，务在排除艰深的、晦涩的、骈俪的、贵族的、浮泛的文学，而建设一种浅近的、明了的、通俗的、平民的、写实的文学，则大概趋于一致”<sup>[19]</sup>。二师教师对新文化运动的宏旨持大力支持态度，与民国初年师范教育勃兴的土壤密切相关。

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甫一成立即通电各省，“顾欲兴中小学校，非养成多数教员不可。欲养成多数中小学教员，非多设初级、优级师范学校不可。……此时注重师范既能消纳中学以上之学生，复可隐植将来教育之根本，是其当务之急者”<sup>[20]</sup>，强调设立师范学校的重要性。从1912年至1922年，全国中等师范学校由253所发展到385所，学生从28525人发展到43846人<sup>[21]</sup>。

从政治社会化的角度分析，帝制覆灭，共和肇始，自然要行“社会教化”，普及共和思想观念；另一方面，共和国的创建必然要开启民智，要求新一代的国民，不但是共和国的公民，同时也是具备现代知识结构的一代新人。师范教育的勃兴，不单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知识结构的问题。简而言之，师范教育不但要培养“共和国的信徒”，还要培养“新知识的学究”<sup>[22]</sup>。

在“共和体制下的教育重建”阶段，“共和”色彩在教育政策中最为突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通令各省，只采用内容符

合共和宗旨的教科书，与共和精神不合的前清教科书、参考书一律禁用。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将“新教育宗旨”定义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善其道德。蔡氏进一步解释“道德教育”的含义，乃是“将自由、平等、博爱的知识传播给人民，而使之产生正确的观念”<sup>[23]</sup>。

胡晋接 1915 年参加全国师范学校校长会议时，递交提案《关于整顿全国师范教育之意见书》，系统论述了师范教育在培养“共和国的信徒”方面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国民教育面临重重掣肘：“国民多未受真正教育，无道德心以为之根基，实为其最大之一因焉”；“以现代国民之少可用者，则一线希望，不得不集注于第二代国民”。胡晋接所言之“道德”或“道德心”，正是蔡元培“道德教育”理念中“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理念。兴办师范教育正是突破此种困境的不二法门：“陶铸第二代之国民，必有人焉”，“而师范学校，即以造成此陶铸第二代国民之人为天职者也”<sup>[24]</sup>。胡晋接 1917 年给陈独秀的信中说到：“此时吾国凡百事业，靡不失败，其大原因，皆由思想未曾革新致然。……仆尝太息痛恨于此日中国之教育，大多数为伪教育，以其形式则是而精神则非，一般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其脑筋中固仍然未变革其数千年来之污浊之思想也。以故兴学垂二十年，而迄鲜效果可言。……今先生所主张之救国主义，独从改革青年思想入手，此诚教育之真精神所寄。必一般青年湔除其数千年来污浊之思想，而发生一种高尚纯洁适于世界二十世纪进化潮流之思想，然后吾国前途之新国民，乃能崭然露头角于新世界，而有以竞存而图强。”<sup>[25]</sup>也正因此，“建立全国师范学校网络被开明的教育家视为维持全国统一的基础”<sup>[26]</sup>。

诚然，共和体制的建立亟须高扬共和精神、普及共和理念、培养新式国民，教育家们更深信开启民智是巩固共和的保障。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回国后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国立东南大学校长的郭秉文指出：“巩固国家非开通民智不可，稳定的共和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公民的智力。”而师范教育在这方面能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郭秉文在分析国民教育的重要问题时，将“教员的培养”作为其中的重要环节，并借此论述师范教育的意义：“新教育发轫之初，政府、人民选定或创造了现代教育的物质形式，诸如校舍、器具、地图之类等，力求丰富完备，然而教育当局惟独无法聘请到数量充足、经过良好培训的教员”；“尽管有大量旧学校中的教职员赋闲，也不能在新学校中找到出路，许多中国科举时代的旧学人缺乏新学校教育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师范学校与师范养成所的毕业生是教员的最大的来源。”<sup>[27]</sup>只有通过师范教育培养出具备“新学校教育所需的知识和技能”的教员，才有可能造就新公民。

民国初年勃兴的师范教育兼有培养“共和国的信徒”和“新知识的学究”双重使命，新文化运动的宏旨与此高度重合，这是安徽省立二师校长和教师们赞颂、支持新文化运动的原因所在。在胡晋接的主持下，二师得到各方称赞。1914 年，黄炎培考察浙、皖、赣三省教育时，参观了二师，他在考察日记中极力称赞二师：“师范学校，余此行所特别注意者。所见可十数，求最足以移我情者，惟斯校乎！”“余观是校，不觉为之神往，夫所谓输入国民必须之思想学艺，而不破坏其淳朴懿粹之美德，俾异日有文明之启导，无习惯之扞格，与夫注意调查研究乡土历史地理农工矿物，联络各地方小学，此岂仅新安师范学校宜然也哉，而非易数观矣。”<sup>[28]</sup>安徽省政府得悉情况后，于 1914 年 5 月传令嘉奖<sup>[29]</sup>。

### 三

安徽省立二师教师在总体上坚定地支持新文化运动的宏旨，但在微观操作层面，却普遍抱持折中、节制的态度。在新文化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加激进的时候，特别是在 1919—1921 年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二师校方对新文化运动的这种态度就显得愈加“不合时宜”。胡适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他 1919 年致黄宗培信说：“先生所痛骂的‘取言论自由之原则而残之’的‘黑暗手段’，其实并不在北京，乃在休宁安徽第二师范学校。北京还没有人敢禁止《新青年》，也还没有人禁止学生看《新青年》。我梦里也想不到子承先生和先生等竟做出这种手段来，甚至于有因此开除学生的事。”<sup>[30]</sup>1924 年，胡适将二师称为“危险”“专制”的学校：“现在真没有好中学堂！那里不是你说的‘机械教育’！二师的危险是很明白的……二师虽专制，却是制造革命党的好地方。胡子承不但替胡适之造了许多信徒，还替陈独秀造了无数党员！”<sup>[31]</sup>

胡适说二师“黑暗”“专制”，是指二师禁止学生接触“新文化”并开除追求新思想的学生。1916 年 8 月入学的章衣萍（洪熙），1919 年被二师退学<sup>[32]</sup>。他后来回忆说：“十四岁进了一个师范学校……在校里读了两年书，又被校长开除掉了，理由是‘思

想太新’，其实什么是新思想，连我自己也不大了然，不过那时我的确有点顽皮，不肯服从教师的命令：譬如教师要学生做古文，我却偏要跟着时髦做白话；教师要学生多读古人的书，而我却偏爱读今人的书而已。”<sup>[33]</sup>柯庆施(尚惠)于1917年8月入二师求学。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学生讲演团“救国十人团”的组织动员方式，自北京迅速辐射到交通闭塞的徽州。1919年5月29日，柯庆施参加徽州救国十人团，加入五四爱国运动的洪流，从此走上革命道路。8月28日，胡晋接致信柯庆施的父亲柯临久：“令郎尚惠因思想一时误谬，遂发生许多误会，酿成一种不信仰学校之心理”，“恐心满气亢无受教之余地，若强迫入校非徒无益而害之，不如留家一年，察其思想已否矫正再行斟酌办理为妥”。出于严明校纪，更出于让青年人“安心求学”的心理，二师对参加学潮的柯庆施采取“留家一年”的惩戒。不过，也留有余地：“寄上题目于日内作就，内容须具有恳切忏悔之意思而类悔过书者……日记亦须记就寄来，内容以多忏悔语为佳”，然后校方可以考虑让其返校<sup>[34]</sup>。

如何解释二师对新文化运动这种折中和节制的态度？是什么原因导致二师在五四运动这个节点上的保守和曲折？可从三个方面分析。

### (一) 追求新旧平衡的核心理念

胡晋接的思想倾向兼有新旧两端，追求新旧平衡。1903年，陈独秀寄居芜湖科学图书社办《安徽俗话报》，胡晋接是图书社的股东，所以非常关注《安徽俗话报》。1904年他给科学图书社写信说：“至《俗话报》出版以来，同人皆颇欢迎，而局外则颇多訾议。如‘自由结婚’等语，尤贻人口实。其实此时中国人程度至‘自由结婚’尚不知须经几多阶级；若人误于一偏，不将‘桑濮成婚’概目为文明种子乎？鄙人甚敬此报，甚爱此报，而又不肯随声附和此报，意欲更图改良，立定宗旨，可乎？请与重翁(陈重辅，即陈独秀)等商之。”他主张“辞旨务取平和，万勿激烈。”理由是：“现在民智低下，胆子甚小，毋令伊惊破也。”<sup>[35]</sup>胡晋接在《新思潮之别择》一文中感慨新思潮裹挟下，国人对“解放”与“改造”的混淆：“解放与改造必相辅而行，若徒一味主张解放，而不知注重改造，则恐举国大乱而至不可收拾之境矣”，“‘解放与改造’，一方言解放，一方即言改造，乃阅者每每但见‘解放’二字，而将‘与改造’三字略过，以此鼓吹岂非大乱之道？”与“解放”相比，胡晋接更看重“改造”的意义：“改字亦含有解放之意义，必先有改而后有造也。”<sup>[36]</sup>

新文化运动发端时，胡晋接是热情拥护的。但他对输入的新思想、新学艺所能接受的程度，恐怕是以“不破坏其旧时淳朴懿粹之美德”为底线的，一旦冲决了这个底线、破坏了新旧平衡，胡晋接对新思想、新学艺的态度恐怕会发生根本改变。待到新文化运动发展到愈加激进的新阶段时，中西文化呈现剧烈的矛盾冲突，特别是五四学生运动之后，学运风潮甚至从北京扩展到穷乡僻壤的徽州二师，新思想、新学艺已经对徽州社会旧有的礼俗秩序发生激烈的冲击，老派学人出身的胡晋接似乎无法接受这样“礼崩乐坏”的事实，柯庆施等被二师除名便无法避免。

黄宗培认为胡适等人文学革命的主张“亦不无偏激之处”，反对“纯用白话文”，提倡“折衷之说”；赞成胡适等人“文学革命、平民政治、社会主义、男女平等”的宗旨，但“方法上间有异议”；更对刘半农等《新青年》人士“徒肆口谩骂”的言论不以为然。在在透露出平衡新旧的折中观念。

胡晋接们的这种态度，也与徽州社会的整体环境有关。对20世纪20年代徽州的师范教育环境，王振忠有精彩分析：“尽管当时进入民国已有十余年了，但徽州人自师范学校毕业，黄卷青灯，壮志鹏飞，与明清时代科举及第的社会反响如出一辙。从迄今尚存的《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讲习科毕业试卷》来看，其间不但各列有一长串先祖、业师之名讳，而且还特别强调‘本校毕业考试及第’，其格式与科举时代之朱卷并无二致。唯一稍有变化的，只是承印此类文卷的书坊，已由著名的‘徽城乙照斋’改为时尚的‘徽城维新斋’而已。”<sup>[37]</sup>在这样的环境中，胡晋接们也不能不行中庸之道。

### (二) 教育不问政治的态度和严格训练的办学方针

胡晋接在二师的办学上，一直秉持“教育不问政治”的态度和严格训练的方针。据黄宗培回忆，胡晋接坚持教育是清高的

事业，办教育、受教育的人都不应过问政治。“五四”以后，黄宗培积极参选安徽省议员，胡晋接得知后要黄氏停止这种政治活动，黄氏就以意见不合提出辞职，离开了二师<sup>[38]</sup>。面对“五四”之后的学潮，胡晋接在致省教育厅董亨衢厅长的信中慨言：“惟学生颇多欢迎新思潮者，方与同人随时利导，示以言论别择的标准、思想革新的指针，以引之归于正轨，不事抑制而亦不敢放任，以此为过渡时代的方法。”<sup>[39]</sup>

胡晋接治校以严格著称。胡氏“五四”之后撰写的《吾国学校宜行严格的训练之理由》一文，感慨新思潮之下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教育之功效，固以学生能实行自治为佳；然此时之学生自治，几与民国共和同为空挂一招牌而已。自各校举行学生自治以来，多数学生益流于放肆怠惰。此无可讳言者也。”他继而分析此种乱象的根源，在于中国学生自幼没有经历严格的训练，“必从严格的训练养成优良之习惯，方有进步”，“教之育之使成优良之习惯”<sup>[40]</sup>。

徽州学者颜振吾从兵家的角度看待胡晋接治理二师严格到近乎“专制”的方式：“指责子承治校专制，绝非空穴来风，而是铁证如山。但也如同大帅统军，若能章法合理、纪律严明、指挥若定，即使一时蛮干，也可以侥幸打胜仗那样。二师十五年里，成绩是卓然可观的。”<sup>[41]</sup>

### （三）新文化运动受国内外局势影响而愈加激进

通览安徽省立二师校刊，在1913—1920年之间，二师采用过不少新的办学思想，如“村民教育主义”“实用教育主义”“社会经济教育主义”等。在1921年这个分水岭，胡晋接校长一反前期的主张，改为推行“务本教育”。

1921年10月刊行的《黄山钟》第一期，胡晋接在《本刊宣言》中对共和十年以来真正缺乏共和的道德痛心疾首：“共和建国垂十载，而民生反日困，国事反日非；除山西以模范省著闻外，几无处非争权夺利纷扰不宁之修罗场者，何也？曰：以共和无本故。所谓共和之本者何？即吾民真共真和之心德也。近日海内谈教育者，多偏重知识，而于道德方面略焉。不知共和乃道德名词。真正共和问题，断非徒讲知识所能解决。”胡晋接认为实现“真正共和”，知识和道德二者不可偏废，故提出“务本主义”的教育方针：“吾校所主张所实行之‘务本主张’，以质正于并世贤哲，以期望吾国未来之新教育，不事枝叶而反于根本，务以道德为重，寡欲崇俭，退让不争；或可致吾民于真共真和也。……夫‘务本主义’本极平庸；然非此殆不足以救时潮末流之失，而为一切教育植其根基。……若吾校年前所怀抱之各种主义，及今思之，殊病其琐碎支离耳。”<sup>[42]</sup>胡晋接教育思想的转向，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国内外情势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文明造成巨大创伤，胡晋接认为“东方文明端在精神，西方文明乃在物质，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物质文明被判死刑的时代，有鉴于此，提倡佛学，讲求精神文明，于人类‘功德无量’。为了修身养性，就必须让学生‘尽性学佛，尽伦学孔，道学为体，科学为用’”<sup>[43]</sup>。

新文化运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同步，与此间国际形势相对应的是，国内思想舆论界也愈加激进。据王汎森对《新青年》的考察，在“五四”之前，《新青年》的发展大约可以分为几个阶段：一开始，它强调“青年文化”，同时也介绍各国的青年文化，这与刊物的名称相符。第二个阶段则刻意批评孔教与军阀因缘为用，并抨击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不合。第三个阶段提出伦理革命及文学革命。而第四个阶段则强调思想革命，认为文学本合文学工具与思想而成，在改变文学的工具之外，还应该改换思想。在“五四”前后，《新青年》中社会主义的成分愈来愈浓，1919年5月的“马克思主义专号”即是一个例证。1921年以后，《新青年》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sup>[44]</sup>。

另据柯庆施1940年写的自传材料：“五四运动以后，我们就看到《新青年》、《新潮》等杂志（开始校长叫我们看《新青年》，后来又不许看，但我们仍买来偷看），受了他们很大的影响，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而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过去那种仅仅是压迫强制得不舒服而产生的反抗情绪，到了这个时期，好像是加了油（思想上的）一般，使我们的思想与学校当局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矛盾，于是冲突更甚。”<sup>[45]</sup>

为什么胡晋接校长开始鼓励学生看《新青年》，五四运动以后又不许看《新青年》？为什么胡晋接的形象，从1917年讴歌

---

《新青年》的教育改革家，短短两年即转变为禁止学生看《新青年》的专制家长？王汎森的论述是极好的诠释：“《新青年》不停地变，新知识分子却不一定能赞同它每一阶段的主张”，“《新青年》像一部急驶的列车，不断地有人上车，不断地有乘客下车，能共乘前一段路的，不一定能共乘后一段路”<sup>[46]</sup>。

既追求革新又折中、节制，胡晋接和他领导下的安徽省立二师与时代洪流发生剧烈的碰撞，这庶几可以作为对新文化运动在徽州接受情况的解读。当然，今天看来，胡晋接们对新文化运动的折中态度，也不乏合理处。

#### 注释：

[1]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第31页。

[2]黄宗培，又名梦飞，于1914—1926年先后执教于县内小学、省立二师、省立第一农校、省立一中等校，曾任《安徽通俗教育报》总编辑，生平见绩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绩溪县志》（合肥：黄山书社，1998年，第896～897页）。笔者曾向绩溪县学者徐子超请教“黄觉僧”为何许人，得到徐先生指点，特致谢忱。

[3]黄梦飞：《往事回忆录》（辑要），《绩溪文史资料》，1985年，第6～7页。

[4]1919年，黄宗培致胡适信云：“前年暑假曾在邑中一面，匆匆未及多谭，至以为怅。”[《黄宗培致胡适》（1919年4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5页]胡适1917年7月27日回绩溪上庄省亲，8月30日离开家乡北返[耿云志：《胡适年谱（修订本）》，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49～50页]。胡、黄二人应是在这期间结识并短暂晤谈。

[5]胡适：《答黄觉僧君〈折衷的文学革新论〉》，《新青年》第5卷第3号“通信”，1918年9月15日。

[6]胡适：《论句读符号》，《新青年》第5卷第3号“通信”，1918年9月15日。

[7]《黄宗培致胡适》（1919年4月12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5～36页。

[8]安徽省立二师学生柯庆施和章衣萍后来都回忆说学校不允许学生看《新青年》，胡适大概是从同乡处得到这个信息[胡适：《致黄觉僧》（1919年5月4日以后），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04页]。上引黄宗培致胡适信中说“敝处无《新青年》杂志”，也从侧面证实二师禁止学生看《新青年》。

[9]胡适：《致黄觉僧》（1919年5月4日以后），《胡适书信集》（上册），第204～205页。

[10]汪俊康、程庸祺整理：《胡晋接先生年谱》，1884年条，载周文甫主编《斯文正脉：胡晋接先生纪念文集》，合肥：黄山书社，2012年，第114页。

[11]安徽省立二师校刊（1至7期称《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杂志》，从第8期起改名为《黄山钟》）和《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录有胡晋接与胡适往来书信七通。

[12]《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杂志》第七期，1920年。

- 
- [13] 《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杂志》第七期，1920 年。另参吴元康《胡适关于安徽清代学人及文献之佚函二通》，《文献》2007 年第 3 期。
- [14] 《黄山钟》第一期，1921 年。另参吴元康《胡适关于安徽清代学人及文献之佚函二通》。
- [15] 《黄山钟》第二期，1922 年。
- [16] 胡适：《致胡近仁》（1924 年 6 月 4 日），《胡适书信集》（上册），第 331 页。
- [17] 胡晋接致陈独秀、陈独秀复胡晋接，《新青年》第 3 卷第 3 号“通信”，1917 年 5 月 1 日。
- [18] 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 年，第 3 页。
- [19] 黄觉僧：《折衷的文学革新论》，《时事新报》“学灯”副刊，1918 年 8 月 8 日。
- [20] 转引自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会研究会编《师范教育学》，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 年，第 53 页。
- [21]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会研究会编：《师范教育学》，第 54 页。
- [22] 参拙作（吴子桐）《民国初年师范教育的黄山钟鸣——〈安徽第二师范学校杂志〉〈黄山钟〉中的胡适与洪范五》，《中华读书报》2015 年 10 月 21 日，第 15 版。
- [23] 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储朝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年，第 120 页。
- [24] 《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杂志》第二期，1915 年。
- [25] 胡晋接致陈独秀，《新青年》第 3 卷第 3 期“通信”，1917 年 5 月 1 日。
- [26] 丛小平：《师范学校与中国的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社会转型：1897—1937》，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年，第 92 页。
- [27] 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储朝晖译，第 118 页、157 ~ 161 页。
- [28] 黄炎培：《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一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 年，第 142 页、148 页。
- [29] 《前安徽都督兼民政长倪训令》，《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杂志》第二期，1915 年。
- [30] 胡适：《致黄觉僧》（1919 年 5 月 4 日以后），《胡适书信集》（上册），第 204 页。
- [31] 胡适：《致胡近仁》（1924 年 6 月 4 日），《胡适书信集》（上册），第 330 ~ 331 页。
- [32] 方光禄等：《徽州近代师范教育史（1905—1949）》，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155 页、301 页。

---

[33]章衣萍：《我的自叙传略》，《樱花集》，上海：北新书局，1928年，第213～214页。章衣萍反复说过胡晋接禁止学生看《新青年》：“我从前在徽州一个师范学校读书，那学校的校长胡子承先生，是个很顽固的人，不许学生看小说(看小说是要记过或开除)，甚至于《新青年》也禁止学生看。”(衣萍：《作文讲话》，上海：北新书局，1931年，第18页)“那时徽州师范学校的校长是胡子承先生，他禁止学生做白话文，看《新青年》，但他愈禁止，我愈要看。……后来竟因此被学校开除。”(章衣萍：《我的读书的经验》，王子坚选编：《现代青年之切身问题》，上海：上海经纬书局，1934年，第60～61页)

[34]周文甫主编：《斯文正脉：胡晋接先生纪念文集》，第92页。柯庆施还是于1920年退学，见方光禄等《徽州近代师范教育史(1905—1949)》，第91页。

[35]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第17～18页。

[36]《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杂志》第七期，1920年。

[37]方光禄等：《徽州近代师范教育史(1905—1949)》，王振忠“序”，第2页。

[38]黄梦飞：《往事回忆录》(辑要)，《绩溪文史资料》，1985年，第6～7页。

[39]《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杂志》第七期，1920年。

[40]《黄山钟》第一期，1921年。

[41]颜振吾：《胡晋接与徽州教育》，周文甫主编：《斯文正脉：胡晋接先生纪念文集》，第155页。

[42]《黄山钟》第一期，1921年。

[43]方光禄等：《徽州近代师范教育史(1905—1949)》，王振忠“序”，第7页。

[44]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245～246页。

[45]汪太戈：《柯庆施在安徽省立二师》，《徽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8期，第50页。

[46]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第246页。